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互构与效能互促

——基于价值取向与制度支撑的双重考察

周明军[1],周愉乐[2]

1.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文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2. 郑州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学生处,河南 郑州 450100

摘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同源一致的价值取向,二者统一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逻辑。在理论逻辑上,二者共享“和合”文化根基、党的领导核心与人民至上立场,形成深层的逻辑互构。在制度逻辑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形成有机整合、保障长期稳定、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供给民主监督机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制度支撑。在实践逻辑上,中国式现代化在内涵深化、职能拓展、文明意涵与形态跃升四个维度对政党制度效能提出了更高要求。新征程上,应从思想引领、制度协同、功能拓展与国际话语建构等维度进一步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助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关键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式现代化;逻辑互构;制度支撑;共识型治理

中图分类号:D621;D61　　**文献标识码**:A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1]。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历史进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一个值得追问的核心问题是:为何中国式现代化能够超越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常见的政党倾轧、社会撕裂与治理困局?答案的关键,正在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所提供的独特政治逻辑与制度支撑。

从学理上看,现代化与政党政治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共生互动关系,“现代化催生政党政治,政党政治主导现代化”[2]。亨廷顿亦曾深刻揭示:“对于正经历现代化的政治系统而言,其稳定与否,端赖政党力量的强弱……凡是那些事实上已经实现、抑或在评判上可被视为政

收稿日期:2026-05-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5BDJ057)

作者简介:周明军(1975—),男,河南省清丰县人,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统战理论与实践;周愉乐(1995—),女,河南省汝阳县人,郑州信息工程职业学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

治高度稳定的现代化国家,皆无一例外地至少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3]377 这一论断提示我们,政党制度的类型与效能,直接决定了现代化道路的成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一种合作型政党制度,与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形成了根本性的类型差异。本文旨在从价值取向与制度支撑的双重维度,系统阐释二者的逻辑互构与效能互促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征程上以制度完善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路径。

一、理论逻辑: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同源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形成紧密的互动关系,首先在于二者在深层价值取向上具有高度的同源性,主要体现在文化根基、历史脉络、领导力量和价值立场四个维度。

1. 文化同根:“和合”传统与制度基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根基,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源泉,二者共同彰显出深邃的文化积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崇尚和合理念、求同存异,注重兼容并蓄、和谐共存”[4]10。它以承认并尊重不同主体之间的差异性为逻辑起点,力求在不同群体间发现共通与交融之处,内蕴着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精神特质,强调尊重多元、寻求共存与共生之道。在这种“和合”文化理念的浸润与影响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认可并尊重各党派彼此间的差异性为基本出发点,借助制度化的对话与协商机制,有效化解各类矛盾与分歧,从而在保持多样性的同时达成一致性。正是通过这一路径,该制度最终构建出一体多元的结构格局,既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的政治稳定,又充分激发了各民主党派的参与活力。

同时,“和合”文化也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价值取向,“现代化与传统并非简单二元对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有其传统文化的根基[5]”。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一点在“和合”文化中有着鲜明的体现。这一文化精神具体体现在中国对外关系的处理之中:始终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践行相互尊重与互利共赢的理念。同时,中国高度重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鉴,不仅积极吸收域外有益成果,也主动分享自身发展经验,致力于同各国共谋发展、共同进步。可以说,“和合”文化为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因此,“和合”文化构成了二者最深层的文化逻辑纽带。

2. 历史同脉:从“三三制”到新型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

任何制度或模式的产生,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偶然现象,而是深深嵌入特定历史逻辑的必然产物。这些制度与模式无不植根于丰厚的历史积累,历经漫长时期的渐进调适与持续完善,最终形成一种由内在动力驱动、能够自我演进的动态运行机制。换言之,它们是在历史进程中逐步生长出来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的:“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6]22 因此,无论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还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都遵循这一演化规律,其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自身独特的历史土壤。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也并非一时一地的偶然产物,其历史根源可回溯至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漫长历史进程。从历史逻辑来看,正是近代中国不断推进的历史进程与日益提高的政治文明水平,共同造就了这一制度,其形成具有内在必然性。辛亥革命后,中国曾试图直接移植西方国家的议会政治和多党竞争体制,然而这类照搬照抄的政党政治实践因严重脱离本土社会实际,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进入抗

日战争时期,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民族面临生死考验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逐步发展出一种密切而牢固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的形成,为此后新型政党制度的诞生积累了宝贵的政治经验与组织基础。延安时期“三三制”政权形式的探索,为多党合作积累了最初的制度经验。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实行的“三三制”政权,“是以共产党领导为前提,包容多党多派而组成的抗日民主政权”,它“建立了与国民党对立的政治制度,大大增进了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7]。

1948 年,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热烈响应。这一行动清晰地表明,他们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此为起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初始形态逐渐显现,支撑该制度得以成立的政治基础也随之初步确立。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顺利召开。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从理念走向实践,获得了正式的制度确认。可以说,从“五一口号”的发布到政协会议的召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走过了从奠基到确立的关键两步。上述历史进程说明,这一制度并非源自外部力量的强制介入,而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各政治力量经过反复比较与选择、经由内生性演化所达成的必然结果。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转换虽在形式上由战争完成,但本质上得益于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构建起的广泛政治优势”[8]。

3. 领导同体:中国共产党作为核心驱动力量

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体系的核心,中国共产党同时承担领导职能与执政职能,属于典型的“统领型政党”[9];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6]22-23。这意味着,无论是政党制度还是现代化道路,其领导力量高度同体。我国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10]

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体系中承担着双重角色:既是法定的执政力量,又是统领国家发展全局的领导核心。从功能分工来看,党的领导主要聚焦于宏观战略层面的谋划与把控,而执政则具体化为政策的贯彻推行及社会治理各项事务的落实,二者彼此依托,构成有机统一的政治实践。在对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政治领导方面,党主要负责协商原则、战略方向及重大政策制定的引导,推动他们有序参与国家治理,同时支持他们加强自身建设,以更好地履行职能。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党的领导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意义:若缺失党的领导,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前行便难以正确展开。面对庞大的人口规模与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现代化建设唯有依赖以科学理论武装的、先进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诚如《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所强调的:“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鲜明特征和重要内容,也是多党合作事业健康发展的首要前提和根本保证。”[4]15-16

4. 价值同旨:人民至上与整体利益代表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设计的核心是“整体利益代表制”,即中国共产党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权势团体或特权阶层,而是“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11];各民主党派则代表各自所联系群体的具体利益,二者结合实现了最广泛的政治代表性。这种“整体利益代表”机制“从结构与功能两个维度实现了政治代表性的最大化与最优化”[8]。

与之相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12]。上述论断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在价值取向上的根本归宿,即始终坚持“人民至上”。这一立场贯穿于现代化进程的各个方面,集中表现为:第一,现代化道路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基

本理论依归,而人民性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始终不渝的内在本质与核心品格。第二,共同富裕作为这条道路的显著标识之一,集中折射出发展进程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所获成果由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的根本宗旨。正是这两个方面,共同凸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因此,二者在“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上高度统一,共同构成了从“为人民谋幸福”到“为民族谋复兴”的价值链条[13]。

二、制度逻辑: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效能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14]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其独特的结构功能和运行机制,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这种保障主要体现在社会整合、政治稳定、民主效能和制约机制四个层面。

1. 社会整合:从“一盘散沙”到有机统一

近代以来,中国长期处于“一盘散沙”的“无组织状态”,难以形成推进现代化的集体行动能力。在此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后发赶超型的现代化,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权威不可或缺,用以承担方向指引与组织协调的功能。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为核心,同时借助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协作,形成了高度的社会整合效能。这一制度具备显著的社会动员能力,能够有效整合全社会的各类资源,并充分调动不同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与此同时,它还将社会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多元利益诉求、实际需求及各种主张,逐一吸纳、汇集,最终融汇于推进共同事业发展的整体进程之中。正是通过这种机制,制度得以实现广泛而有效的利益整合。这种整合既体现于对各方利益的平衡与协调,更表现在对社会共识的建构与凝聚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紧扣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持续巩固和扩大共识。在其“1+8+1”的制度架构内,中国共产党不仅是领导党与执政党,按其性质而言更是“两个先锋队”,本身即广泛代表各界群众利益;与此同时,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也从各自角度反映所联系群众的利益与诉求。二者相结合,使得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利益代表性达到了最广泛的程度[15]。

这种社会整合功能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超大型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必须维持高度的社会整合。凭借“一元领导、多元参与”的运作机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成功地将各类政治与社会力量整合进统一的政治体系之中,实现了一致性与多样性的有机统一。

2. 政治稳定:克服党争与规避内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我国政治格局稳定的重要制度保证”[16]。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17]。

该制度以合作协商而非竞争对抗作为运行逻辑,从而在根本上规避了多党竞争可能引发的政治动荡。与西方政党制度“否决政治”导致治理失效不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了“共识型治理模式”。通过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减少决策过程中的社会内耗,这一制度能够有效吸纳与化解社会矛盾。亨廷顿的理论在此得到了反向印证:正是因为没有陷入竞争性政党政治的陷阱,中国才得以在高速现代化进程中维持了长期政治稳定。据亨廷顿的观点,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而言,政治共同体的形成需同时满足两个方向上的要求:一是“横向”上整合各类社会群体,二是“纵向”上吸纳并统一社会阶级与经济阶层[3]366。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恰恰满足了这两方面要求。

现代国家政治稳定的实现,往往依赖于两个关键条件:一是存在一个具有强大领导与整合能力的核心政党,二是拥有能够广泛吸纳并同化新兴社会力量的政治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设计,恰恰有机融合了这两方面要求。它通过规范政党关系、党政关系以及政党与社会关系,既确保了执政党的坚强领导核心地位,又构建了多元力量有序参与的制度化渠道[18]。这种结构性格局,使其在应对社会变迁与矛盾时,能够持续展现维持长期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的显著制度优势。

3. 民主效能:协商民主与全过程人民民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19]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框架下发挥着重要的民主效能。它为广大人民群众开辟了一条参与国家治理、社会事务以及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的关键性民主路径。换言之,这一制度使得人民能够在多个领域有效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从而保障了民主的广泛覆盖与深度介入。

就其民主效能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通过扩大有序政治参与,畅通多元利益诉求的表达途径。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基于制度化平台,广泛收集并反映社情民意,有效拓展了政治参与及利益表达的范围和深度。其二,提升民意的系统化提炼与整合能力,借助人大、政协等平台,在对广泛民意进行汇集的基础上加以分析与提炼,进而将民主过程深度嵌入决策环节,确保决策兼具科学性与民主性。其三,改进民主监督的方式,使民主延伸至决策、执行、监督的每一阶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20]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从根源上克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党相互倾轧、各谋私利的弊病,从而彰显出其在推进人民民主方面所特有的优越性。

若从比较政治学的视角加以审视,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在理论层面常打着"一人一票"的旗号,以此宣称自身具备普遍代表性。然而,一旦进入实际的政治运行过程,这种制度在代表性上的局限性与碎片化特征便日益凸显,难以真正承载广泛而整体的民意诉求。究其原因,在资本主义政治架构之下,政党在本质上不过是特定利益集团或部分选民的代言者,难以代表整体社会的共同利益。各类利益诉求在彼此竞争的过程中,常常被化约为"我方"与"彼方"之间的非此即彼的对立博弈,呈现出零和性质。各方愈加分立,共识愈发稀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所构建的"整体利益代表"机制,并不着眼于特定群体之间的胜负角逐,而是致力于在多样诉求中寻求最大公约数,从而在政治代表性的广度与深度两个维度上,分别实现了最大化与最优化的目标。

4. 制约机制:民主监督与权力规范运行

民主监督是各民主党派的重要职能之一,其实现方式主要体现为: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并发言、提出提案,组织并实施实地调研与考察活动,对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及决策部署的执行情况开展监督检查,以及正受中共党委委托,就特定重大议题展开专项性的监督工作。在上述各项工作过程中,他们以批评性、建议性的意见形式,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

在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清正廉洁、高效运作的政治环境至关重要。民主监督有助于防止权力滥用、腐败现象滋生,确保各级政府部门在现代化建设中依法依规履行职责,保障公共资源合理分配和使用。以脱贫攻坚民主监督为例,各民主党派中央分别对口 8 个贫困人口多的省份,开展历时五年的专项监督,"各民主党派共有 3.6 万人参与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向对口省

区各级中共党委和政府提出意见建议2400余条,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各类报告80余份”[4]25,有力推动了精准扶贫政策的落地见效。这种制度化的制约机制,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健康的政治生态保障。

三、实践逻辑:中国式现代化对新型政党制度的时代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推进,必然对政党制度的包容性、整合力与治理效能提出新的要求。从制度效能转化的视角审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进程,必然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提出新的、更高的适配性要求。

1. 内涵深化:回应社会结构变化

随着时代发展,新型政党制度的内涵建设需要不断深化。一方面,要适应社会结构的变化。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向纵深推进,产生了大量新兴社会阶层,如自由职业者、新媒体从业者、民营经济人士等。各民主党派需要更好地反映这些新的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扩大自身的社会基础和代表性。而这些新兴社会阶层“形成历史短,缺乏足够的稳定感和安全感,因而在政治参与上必须进行适当的引导规范”[21]。

另一方面,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政党制度需要不断优化自身的运行机制,提高政党协商的质量和效率,加强民主监督的实效性[22]。具体而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内涵建设需要在理念引领、发展路径与目标导向三个方面做好深化工作。这意味着,政党制度不仅要适应社会结构的变化,还要主动引领社会整合的方向,将新兴社会力量纳入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

2. 职能拓展:覆盖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完整链条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坚持与推进,客观上要求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进一步拓展其功能覆盖范围并深化其作用层次。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该民主形态的突出特征在于,民主的原则贯穿于政策制定的整个流程,广泛覆盖社会各个领域。从民主过程来看,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各个环节在时间上先后继起,前一环节为后一环节奠定基础,后一环节对前一环节加以落实,彼此有机衔接,最终共同构成一个完整且连贯的民主运行轨道。

因此,新型政党制度不仅要继续发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政治协商等传统职能,还要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23]。具体而言,需着力强化两大维度的制度供给:其一,在实践主体维度,需持续增强制度对社会结构变迁的适应性,通过有序扩大政治参与,特别是提升新生社会阶层的制度化参与水平,以拓展其政治吸纳与利益代表的广度。其二,在实践过程维度,需系统性地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有机衔接,构建覆盖“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全过程的民主程序闭环,从而形成一个环环相扣、完整高效的民主治理链条。

3. 文明意涵:从国内治理到全球对话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内在属性,与坚持和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了深刻的内在契合,二者共同植根于中华文明崇尚和谐的核心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深刻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24]

基于这一逻辑,该制度的功能定位需实现从国内治理向国际交往的“双实践”拓展:既要在国内政治生活中持续发挥整合与引领作用,也需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展现其制度理念与实践智慧,参与全球治理对话。在国内层面,制度通过强化政党间协商共治机制,将“和而不同”的政治传统转化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动能。

在国际层面,该制度依托“一带一路”等合作倡议,将其内部协商治理经验升华为超越意识形态差异的全球公共产品,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彰显“协和万邦”的文明自觉。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政党责任为政党建设的伦理内核,为不同文明的和谐交流贡献了政党与政党制度理念”[25]。中国共产党先后于2017年、2021年、2023年举办了三场以“政党责任”为主题的全球政党高层对话。其中,2023年3月召开的对话会将“现代化道路:政党的责任”定为主题,强调政党应当回应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系列核心议题,并以此引领和推动现代化实践。可见,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政党责任观,不仅拓宽了政党的作用边界,也有助于促进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与互鉴。

4. 形态跃升:迈向人类文明新形态

从理论逻辑与实践形态的互动来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植根于“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所提供的根本遵循。这一历程,不仅完成了对传统政治文化资源的现代性激活,更以其独特的制度架构与运行效能,深刻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模式、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深远意义。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性变革,要求新型政党制度在政治文明形态上提升政党协商的深度和广度,增强政党监督的有效性;在社会文明形态上强化社会整合的多元性,关注数字化、全球化背景下新出现的公平问题。这既是挑战,也是制度自我完善的契机。因此,需要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持续发力,推进制度创新与理论创新,使这一文明新形态获得更广泛的国际认同。

四、路径逻辑:新征程上以新型政党制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要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阐述“十五五”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目标任务时,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新征程上,应着力从以下维度推进。

1. 强化思想引领,筑牢政治根基

民主党派应持续以思想政治建设为核心,建立理论学习常态化机制,将政治共识内化于日常履职之中。新征程上,民主党派应进一步丰富其思想政治建设的新内涵。具体而言,应强化思想引领,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各民主党派应立足自身历史脉络、组织特质与所联系社会群体的结构性特征,系统开展具有界别特色的理论研究与创新。

在实践中,必须坚持“第一议题”制度,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放在首位,以此确保新型政党制度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运行。按照这一制度安排,凡是涉及政党协商、政治协商的相关活动,均需把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以及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摆在议事日程的最优先位置。通过这样的议题设置,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便能够及时且准确地传达到各民主党派以及各界代表人士当中,使其真正入脑入心。从制度功能上看,这种做法既体现了党的领导力量在多党合作领域的延伸与现实,也展示出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对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的自觉认同。更为重要的是,它构成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坚实依托,为多党合作事业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

2. 释放制度潜能,提升履职效能

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关键在于实现执政能力与参政能力的双重增强。一方面,要完善政党协商机制,将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落到实处。就其性质而言,这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民主形式,体现了协商民主

在政党层面的制度化运作。另一方面,要健全参政议政成果转化机制,使民主党派的调研建议真正进入决策程序。以“十四五”规划的编制与实施为例,全国政协依托自身协商平台,广泛汇集了各领域委员的意见,其中不少建议最终被采纳。同时,要推动民主监督与其他监督形式协同贯通,实现监督力量的系统集成与效能叠加。“民主监督是国家监督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提升其实践效能,就必须突破体制内外的制度壁垒,实现与人大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等各类监督主体的协作”[8]。

此外,要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这是因为,“制度化、规范化与程序化是制度建设中的关联系统,标志着一项制度步入确定性、稳定性与现代性的发展轨道”[22]。推进这“三化”建设要始终沿着法治轨道展开。同时,要把宪法作为根本依据,通过借力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把法治精神和法治要求有机融入制度运行的全过程。

3. 拓展国际视野,加强话语建构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对了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但其制度发展水平与国际话语权尚不相称。凭借自身的制度优势与治理成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有力冲击了西方中心主义长期把持的政党话语格局,初步改变了以往在这一领域“失语”的状态。但制度话语终究要靠制度绩效来支撑,眼下“制度发展水平与话语影响力不相称”的困境依然存在,需要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加以破解。

解决这一问题,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条线同时展开。从理论层面看,推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创新,应当减少重复性、解释性的研究劳作,把更多精力投向具有突破意义或能够在既有理论框架基础上加以延伸拓展的探索方向。当前已有若干颇具启发的研究尝试:有观点认为,政党团结业已成为当下我国政党关系的基本态势;另有学者从“同廉”的视角出发,对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阐释;还有人在合作型政党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质上是一种典型的“全时性竞合”体制[26]。这些努力,都让该制度的思想内涵和理论根基变得更为深厚。

就实践层面而言,应依托“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主动运用政党制度的独特资源,整合党外人士与海外华侨的跨国传播网络,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文明传播优势。要在国际场合讲好“中国政党故事”,以“合作型政党制度”的类型学创新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政党话语霸权。要通过持续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展示,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五、结语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中国式现代化在价值上同源,在文化、历史与实践逻辑上紧密关联、三位一体。前者是后者的必然政治结晶与核心制度表征,后者则为前者的效能发挥提供了时代场域与目标指引,二者共同定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独特路径。从“同源”到“共进”,从“逻辑互构”到“效能互促”,这一关系本质上回答了一个重大问题:一个超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实现持续、包容、和平的现代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新征程上,要充分发挥制度优势,持续提升制度效能,按照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在理论指导、职能定位、实践形式和实践效果上不断释放新型政党制度的潜力。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深入基层协商民主的具体案例,或开展中外政党制度现代化的比较分析,以丰富和深化这一领域的学术积累。借助中国式现代化来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一项兼具系统性与复

杂性的重大工程。需要各方协力、共同推进,必须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以更好地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地凝心聚力,贡献更多的政党制度伟力。

参考文献:

[1] 本书编写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学习出版社,2025:44-45.

[2] 王韶兴.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J].中国社会科学,2019(6):4-24,204.

[3]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5] 沈湘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传统文化根基[J].中国社会科学,2022(8):109-123,206-207.

[6]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7] 蒯正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发展与优势彰显[J].理论建设,2024,40(2):12-21.

[8] 柴宝勇,杨子兴.以新型政党制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经验、逻辑阐释和未来进路[J].协商治理研究,2025(4):1-19,177-178.

[9] 王天海,王彩玲.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内涵、发展逻辑与文明价值[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0(1):68-75.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8.

[1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1.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64.

[13] 史诗悦,钱再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党责任: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视角[J].理论学刊,2024(3):32-39.

[14]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119.

[15] 张师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阐释[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6):49-57.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75.

[17] 习近平.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18-03-05(1).

[18] 祝奉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新型政党制度效能研究[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4(1):26-33.

[19]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258.

[20]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8.

[21] 齐春雷.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中国式现代化相融共进的内在逻辑[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5):36-44.

[22] 钟德涛,付瑀.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性建设:历史演进、鲜明特征与实践价值[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8(5):28-42.

[23] 钱再见.为人民谋幸福:新型政党制度中的政党责任[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102-110.

[24]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4.

[25] 付瑀.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制度逻辑: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视角[J].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5(1):129-140.

[26] 张春满.中西政党政治的实践、研究范式和方法:一个理论反思[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9(5):126-137.

[责任编辑:王天笑]

引用格式:周明军,周愉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互构与效能互促——基于价值取向与制度支撑的双重考察[J].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